逆境中探索的思想家
——顾准思想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 张曙光

▶▶▶[上接03版]

第四个思想，就是关于民主科学和进步史观。顾准对于什么叫科学精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认为所谓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科学上的成就，而是指：第一，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第二，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第三，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第四，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第五，每门知识、技术在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和工艺制度，但是大家必须无条件的承认，唯有违反和超越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取得进步。所以，他批判一元历史观，批判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段论，认为科学精神可以推动历史进步。而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认为哲学上的一元论就是为政治上的专制提供依据的。

顾准主张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没有什么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和第一原因都是基督教的传统，是哲学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顾准认为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连接的，而不是与某个目的相连接的，没有什么终极目的的，只有科学精神或者只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世界上建立共产主义，顾准认为这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这是彻底的幻想。而且认为革命家都是民主主义者，革命家一旦确立了终极目的，相信这个终极目的，并且为之奋斗，他为了这个终极目的就不惜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第五个问题，就是关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把问题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讨论了顾准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即一切认识都离不开经验，而从经验归纳、概括得到的认识的真理性，从来都是今后也将几乎完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真理。说真理是绝对的，或者能够是绝对的，这个判断难以成立，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化了，而是说它没有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这是顾准讲的。所以他对列宁和恩格斯关于人类认识的无限性，绝对真理性是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这种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来自黑格尔体系，这是唯理主义。唯理主义，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他们唯有坚持革命是唯物的、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即是善才能勇往直前。顾准揭示了马克思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和培根哲学的神妙结合，黑格尔哲学就是三个定理两个主义，三个定理就是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两个主义是真理的不可分主义和事物真理性的一元主义。黑格尔是唯理主义者，唯理主义者都是神学家。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面批判了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但是没有批判三大定理和两大主义。而接受了黑格尔三个定理和两个，并且加以培根主义的改造，第一，真善一致，理论和实践一致，不过从此理论和实践是真枪真刀玩命的事情，不是空谈可能达到的。第二，实践在培根那里是生产实践，马克思是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人应该在实践中证实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及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样，顾准不仅批判了马克思终极目标——共产主义是地上天国，而且批判了马克思的哲学，认为马克思是把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顾准不仅揭示了理想主义和唯理主义的实质和联系，而且坚决地走向了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顾准有几句话是非常精彩的，也描绘了顾准的心路历程。**他说："我也痛苦地感到，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的解决"。**

"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青年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第432页）。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第454页）这几句话既可以说明顾准思想的转变，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能够达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

从上述关于顾准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做出结论，顾准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彻底解放了的，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貌似强大、不可怀疑的权威，更没有什么不可冒犯的强权。他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一方面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批判，将我们曾经视为神圣的马克思主义请下了神坛，还原了其作为人类思想认识历史的一个片断和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进行了探索，对历史的进步充满了信心。我认为他的理论的作用是巨大的和无形的，中国的当代人和后代人都会沐浴到他思想的雨露和阳光。

当然，顾准的思想也有局限性。我那天在西学经典会上对刘军宁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我认为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现在国内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从中国的语义学来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主语，民主是宾语，社会民主主义恰好反过来了。从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它的基础结构是私有产权制度，它的社会福利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之上，也就保证了它的社会政策的实施。所以这个社会民主主义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当中，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当然，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开始它也想没收没收资本，但是后来变成承认和尊重私人资本，而通过高额征税来实行社会政策。但是，它的基本结构，私有产权制度没有变化，这一点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民主社会主义立足于公有制基础之上。大家知道《共产党宣言》里面最重要的话，就是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然后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这个不可能做到。

顾准曾经明确地说，他不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而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认为这个概括是准确的。它表明顾准一方面主张民主政治，另一方面主张消灭私有制，我认为这个逻辑是断裂的。因为顾准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制总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很好"。"事实上私有财产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遭到鄙弃，不幸，保存私有财产权的西方工人生活的比苏联要好"。这是顾准的明确说法。大家可以看到，民主政治只能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在公有产权制度上是不可能出现民主政治的。因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和核心理念是税权法定、预算公开。因此，宪政和民主政治与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事实上，在历史上宪政就是在争夺税权的过程中间建立起来的。所以从这点上咱们认识顾准，一方面要看到他的伟大，另一方面也看到他的理论上局限。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顾准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发展，我把他分为三个过程。第一个阶段是1952—1955年，从受处分到在党校读书。这个时候他因为过去没有读书，现在读了马克思的书，读了《资本论》，对《资本论》称赞得不得了，认为《资本论》既是理论著作又是文学著作。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革命年代里面没有好好读书，读书以后感到自己知识的缺乏，自己的浅薄，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时间了，不能详细讲了这是他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1956—1962年，从苏共的二十大到大饥荒，为什么这么划分呢？顾准之所以参加革命，除了他家庭矛盾以外，因为顾准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继室，他父亲两个夫人，大夫人是他母亲的姐姐。所以他们有六七个孩子，家里面矛盾很多，所以他参加革命，除了躲避家庭的原因以外，还有两个原因，这是顾准自己说的，一个是民族危机，顾准说，"眼看着拯救民族危亡，南京政府不行了，目光就转向了中国共产党"。第二，苏联的榜样。"30年代初期，我思想开始转变，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苏联的影响、斯大林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到了五十年代，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救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二十大使他的信仰彻底破灭。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独断专权，特别是在肃反中乱杀无辜。顾准听了传达以后，"对苏联和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从'圣洁'到'厌恶'的巨大变化，不免使我的革命发生某种程度的'幻灭'之感"。大家想想他参加革命两条，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也发生了问题。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尽管苏联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56年6月14号（注意，苏共二十大是2月份），顾准写过一段话，他说，"所有这一切不能不感谢我们党的领导集团，其中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接受了中国的历史遗产，运用了马列主义，拒绝了斯大林的横暴的干涉和置中国革命于附庸地位的错误态度，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结束了那说不完的混乱，而且在思想上、文化上也把中国恢复到了它原有的高度。这个历史作用后世的人也永远不会忘掉的，至于其中有过一些小小的瑕疵，应该原谅。拿俄国革命来比，也是最小的瑕疵，只是应该有一个愿望，就是曾经跟过斯大林主义一小段，或者自我陶醉过几天，希望今后永远不要再有"。但是，反右派运动把他这个梦彻底打破。1961年到商城劳改跌入了社会最底层，也在最底层看到了中国的现实，从此顾准的探索走上了不归路，就是要探索革命胜利以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革命后的现实和的理想截然相反，有天壤之别，为什么是这样？所以他探索的中心是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就是他后来使用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他的成熟阶段，当然这个里面有挫折，我只是简单地讲这个过程，咱们可以看到他思想的转变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自己认识的转变过程。

这里我还要做一点评论，讲一下顾准的局限。顾准提出和探索"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即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问题，是相当了不起的，在中国只有他提出和探索了这一关系到中国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具体我没有讲了。仅就娜拉走了以后怎样的问题说一下。娜拉是挪威剧作家卜易生《玩偶之家》的主人公，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时提出娜拉问题，是讲妇女解放问题，探讨是个体的问题。而顾准提出的娜拉问题，探讨的是群体问题。**顾准就娜拉问题的发问有8次之多。具体我不讲了。通过这8次发问，顾准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只能实行民主政治，只能走议会道路，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对此他坚信不疑。**但是怎么走向这条道路？顾准没有解决，他也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顾准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把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比较一下，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在社会基础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来改变政治的治理结构，即是要在现有的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民主政治制度来。所以，在革命胜利以后就不断完善，不断修正、不断改良，不断前进。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而且要改变整个社会的基础结构，要挖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建立一个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改造社会、改造人。就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搞一个上层建筑，然后把地基挖掉，重新建立一个基础，于是这个革命就没完没了。所以，这两种革命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完全走偏了。

最后讲怎么评价顾准的问题。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因为顾准在1967、1968、1969年曾经写了30万字的《我的自述》，写了10万字的《新生日记》。里面有很多检讨、认罪、认错的表示，有很多自污的语言，也有很多附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如拥护打倒516反革命集团，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之类。正因为如此，对于顾准的评价发生了分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林贤治写了两篇关于《两个顾准》的文章，明确指出：一个是思想者的顾准，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寄生体的顾准，说顾准染了严重的猩红热，而且认为两个顾准不仅是同时性的，而且是历时性的。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李慎之的看法，李慎之也写了文章，题目就是《只有一个顾准》，就是思想家的顾准。当然这里还有沙叶新、陈敏之、丁东、曾彦修等人，沙叶新认为顾准写的那些检讨都是假话，李慎之认为是写思想汇报的底稿，而且还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丁东基本上同意李慎之，但又有区别，他对顾准的言论做了一些区别，认为哪些是正话反说，哪些是假的。要讨论顾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正确评价顾准，既是对死者的一个尊重，也是对生人的一个交代。所以我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同意林贤志有两个顾准的说法，但是不同意他对两个顾准的界定，而不同意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的说法。为什么我同意有两个顾准呢？我认为，一个是常人的顾准，一个是思想家的顾准。顾准既是思想家也是常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作为常人，大家可以看，人确实都有可能犯错误，都有很多人性中间的弱点，比如瞻前顾后、权衡利弊、得失选择、七情六欲，等等。顾准之所以检讨，之所以认罪，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他写下30万字的自述，是要给后人留下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在当时严酷的现实之下，他又不能明明白白地写，这样写的东西就会被收走、被烧掉。所以，就以检讨、认罪的形式写出来，这样就可能保留下来。我今天对顾准的解读很多都是从这里面来的，所以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顾准在《新生日记》中曾说，他要跟毛主席继续革命，为什么要之样说，他的继续革命就是自己要继续进行探索，而不是毛泽东的那个继续革命。他为什么要认罪、检讨、写新生日记？写这些东西，人家也不会原谅他，他也不可能再回到革命队伍，但是至少可以减少对抗和冲突。你想想，整天批斗你，你有心情吗？如果减少批斗，他就可以坐下来读书、学习、探索，我猜想，顾准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就是顾准确实想见他的亲人，想见儿女，想见他的夫人，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夫人自杀的事情。军宣队告诉他夫人自杀了，但原因、情况、遗言一概不知，顾准一边吃饭，吃着吃着就趴在饭盆上嚎啕大哭。他在《新生日记》写道，他买了25张邮票和一大堆信封，现在留下不用，到时候给儿女写信，他们会理解，会来找我的。他是要见自己的亲人，但是直到临终，一个亲人也没有见到，他的母亲甚至近在咫尺，也未能相见。可见专制体制非人性、反人性的本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写这样一些东西，检讨也好，认罪也好，用官方意识形态语言也好，都没有什么责备他的地方。当然林贤治按照文本，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依据，但是我认为，不能那么看。确实人性是有弱点的，和顾准的坚强不屈相比，我自己就很软弱，打成5.16反革命的时候，我被迫承认了、检讨了。

我为什么不同意李慎之的说法，特别是严厉批评李慎之的观点，这一点相当重要。尽管有"南王（元化）北李（慎之）"之说，他们力倡思想解放、主张民主、批判专制体制，确实很了不起。但是在顾准的问题上，我认为他是错的，他仍然在造神，有意无意搞英雄崇拜。中国社会是一个造神的社会，毛泽东将此推到了极端，大家想想，文化大革命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搞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咱们还没有走出来。你可以看看，现在政治家出来，报纸上的报道，太阳都格外放光。再看那些名人大腕的传记，哪一个不是高大全，哪一个不是伟光正？哪一个不是从里到外都干干净净的人？这就是咱们社会的现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像李慎之这样的自由主义民主战士都没有去昧，何况一般社会大众。中国人何时能够不再造神，不再盲目崇拜，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思想负担才能解除，中国社会才能进步。（完）

官员懒政
——中国经济隐忧

■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是拖累经济增长的主因。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2014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3%，增速比2013年低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7%，增速比2013年低4.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下滑最为突出。2014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0.5%，增速比2013年低9.3个百分点。一般认为，快速城镇化阶段的终结是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压力来源，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的逆转拖累了上下游产业链。不过，从最近的一些报道看，造成经济放缓的不只有大的经济形势，官员们的懒政与不为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据中国中央政府网转载的一篇报道称，国务院2014年国庆节之后密集启动了一批重大发展和民生工程，实施情况并不理想：投资完成率虽然总体上达到86.8%，但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50%左右；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了16.5%，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报道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在前不久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到了这些不理想的数据，并说，"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少有的。项目批了，资金下了，土地供了，为什么工程上不去，要从精神状态、作风行为上找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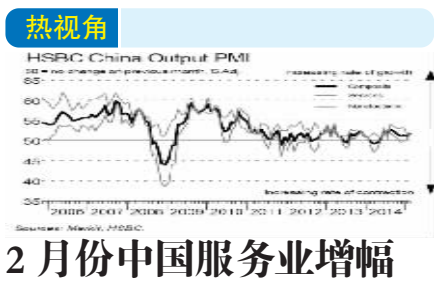
类似的情况在一些基层调研中可以得到验证。国家发改委投资司研究员罗松山在2014年的一次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原本正在进行或者准备上马的重大投资项目，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落马而被停了下来。原本活跃的资本方，也由于当地政治生态的变化而遁匿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由于官场环境和人事的变化，而不敢作为。他们担心在他们无法明确预期的不确定时期，做什么都容易出问题，索性干脆不做。换言之，懒政与不为已经成为制约财政与投资政策效果的消极因素，在地方上形成了实质上的财政政策紧缩。

在中央反腐败重压下，地方官员出现懒政与不为不难想象，反腐败令地方政商熟悉的交往范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对基层官场生态形成震慑。不过，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在2015年可能将遭到治理。去年四季度以来，眼见于懒政与不为，中国总理李克强连续作出表态。在去年10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李克强强调，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在今年2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警告称，身在岗位不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该负的责任不负，该干的事情不干，不符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要求，不符合依法履职的要求，不符合反腐倡廉的要求。

从李克强的困惑，以及他在不同国务院会议上甩下的狠话看，今年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不作为的隐忧。既有可能是客观上的无法作为，经济形势不景气导致有力难施，也有可能是主观上的不作为，也就是懒政与不为。尤其是后者，将成为国务院主抓的对象，但最终效果很可能不及预期。从十八大以来的连串腐败案看，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积弊已久，已成官场流弊，并非顷刻间便能扭转。反腐败的力度当然要持续，在这样的形势下，要让地方官员高涨起与以往不相上下的热情，恐怕并不容易。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当前，政府官员的懒政与不为令今年中国经济更添隐忧。在反腐败高压下，政府官员转换行为范式并不容易，虽然中央三令五申，最终效果可能仍不及预期。这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种隐忧。（FT中文网）

热视角



2月份中国服务业增幅略有提高

根据汇丰银行(HSBC)开展的调查，2月份中国服务业活动的扩张幅度略有增长。

该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读数为52，略高于1月份51.8的6个月低点。这一指数由汇丰银行和Markit共同编制，该指数高于50，表示相关产业处于扩张之中。

这一读数的低迷，显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需求处于疲软状态。不过，汇丰银行表示，"坊间有证据"称新的项目正在上马、客户需求十分强劲。

Markit经济学家安娜贝尔·菲德斯补充说："最新PMI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服务业依然处于扩张区间——尽管其增长幅度依然很低。不过，新订单的强劲增长，意味着今后几个月服务业活动的增长幅度或将扩大，原因是在积极的商业前景下，企业会继续招揽更多员工。"

此外，汇丰银行还发布了将制造业和服务业PMI指数相结合的2月份综合PMI指数。2月份该指数从1月份的51上升至51.8，这是5个月内的最高点。（FT中文网）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三环路北一段成彭立交内侧 电话：(028)87319500 87342251(传真) 北京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3号5号楼 电话：(010)87721045 52896956 52896958 87527365(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工商广字5100004000280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